政治科學論叢 / 第 99 期 / 民國 113 年 3 月 / 頁 69-110

地方派系與樁腳轉型：高雄市的個案分析*

楊天傑**

摘　要

臺灣地方政治與侍從主義，早期由國民黨所掌控，民主化後學者們的爭議在於地方派系結構是否瓦解？或者是並未消失只是零碎化、山頭化？亦有學者將這兩種觀點整理成肯定說及否定說。本文以高雄市爲個案，主要關心派系的存亡與否，再檢視地方派系與樁腳是否變遷，並分析地方派系的樁腳轉型的類型與特質。因爲在縣市合併前後，高雄市的市派幾乎都掌握著高雄市議會，若市派已消亡，又何能如此？是否縣市合併（2010 年）是一個刺激點，2014 年學運又帶來更大之衝擊？刺激了地方派系及樁腳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轉型？本文以合併後 2014 年和 2018 年地方選舉爲主要研究範圍，並延伸至 2020 年補選及 2022 年選舉。本文採取深度訪談法，訪談對象包括地方政治菁英以及耆老和學者等，以蒐集第一手資料。本文發現，一些小樁腳滲透到各種人際網絡，進而在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可能成長爲大樁腳，並以相當韌性的方式轉型而存活。據此，本文提出三種樁腳轉型，分別是傳統垂直的農會、相對水平的里長及相對水平的宮廟。研究亦發現，合併後縣派弱化但市派吸納了縣派生存下來。本文的初步研究成果，期能提供學界進一步探究臺灣地方派系與樁腳轉型理論之參考。

關鍵詞：樁腳、地方派系、侍從主義、社會關係網絡

---

* DOI:10.6166/TJPS.202403_(99).0003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E-mail: 109252503@nccu.edu.tw。

收稿日期：112 年 2 月 12 日；通過日期：112 年 10 月 30 日

壹、前言

研究臺灣地方政治的學者討論中爭議很多的，是地方派系與傳統侍從主義是否已經崩解式微，或是弱化、零碎化、山頭化但還存在？又或者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逐漸變化轉型？學者們皆認爲傳統侍從主義與地方派系，是國民黨治理臺灣之後的地方政治特色，但解嚴後又歷經民進黨成立、政權更迭的一連串民主化變遷，學者們也嘗試去探究民進黨執政後是否亦建立了屬於民進黨式的新侍從主義？陳麗雅、王業立（2019）的文章，則將學界對於地方派系於民主轉型後是否消失的爭議，歸類出肯定說（王金壽，2004b；王金壽、翁立紘，2019；黃德福，1994）及否定說（丁仁方，2019；丁仁方等，2018；王業立、蔡春木，2004；陳麗雅、王業立，2016；張佑宗、盧信宏，2014；趙永茂，2002；蔡榮祥，2014）兩種見解。這些眾多學者的研究貢獻是相當可貴的，肯定說及否定說皆有其觀點與論證，筆者則是嘗試描述地方派系在面對衰敗時爲了存活下去，會設法轉型以爭取延命的機會。

王金壽、翁立紘（2019）的文章，對於臺灣地方派系的現況，與丁仁方、趙卿惠、李依霖（丁仁方等，2018）的觀點展開對話，除肯定他們開拓新理論的貢獻，也期許未來的學者以更多實證及田野調查來進行研究。筆者也在此脈絡之下得到啓發，並以高雄市爲研究對象進行在地觀察及訪談。爲何選擇高雄市，是因爲爬梳文獻發現，學者們研究高雄地方派系，一直都很重視縣派的紅白黑三大派系，對於市派，則認爲很弱甚至已經不存在了。但筆者對此抱持一些質疑，因爲長期在地觀察市派的地方勢力，儘管民進黨自 1998 年後一直執政，市派仍持續掌握大部分市議員席次及議長寶座，至 2010 年縣市合併之後，亦是如此。若市派地方派系已消亡，爲何縣派不能取得主導權？2014 年發生太陽花學運，國民黨支持度盪到谷底，市派與縣派都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是否在這時間點意識到爲求生存不得不轉型？這些都是本文認爲值得探究的。

本文嘗試以王金壽（2004a）檢驗派系與椿腳變遷的標準，以此視角來重新檢驗地方派系與椿腳是否瓦解或轉型（2004a：184-188）。並循著重要

理論、指標期刊的文獻檢閱，透過深度訪談取得之第一手資料，找出一些可能性的推論，例如 (1) 派系轉型需透過樁腳轉型來完成；(2) 樁腳轉型可能由無意識到有意識；(3) 高雄市樁腳轉型之關鍵時間點可能是 2010 年的縣市合併及 2014 年太陽花學運；(4) 哪些樁腳類型具有轉型之代表性及其特質爲何；(5) 縣派可能走向式微而被市派吸納或重組。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獻分析外，並透過在地菁英之深度訪談作爲驗證。訪談對象以熟稔高雄市地方政治發展及參與地方選舉的人士爲主，類別包括地方耆老、仕紳，以及立委、市議員、里長等民代以及學者等，並從中取得相關資料作爲研究論據。

貳、文獻檢閱與理論辯證

一、研究地方派系的重要理論

臺灣政治學者們皆認爲地方派系是國民黨治理臺灣的地方政治特色，而研究的重要理論有二，其一是恩庇侍從主義，其二則是社會關係網絡的理論。吳乃德是學界公認研究臺灣地方政治的先驅典範（王金壽、翁立紘，2019：128-129），吳乃德（Wu, 1987）認爲，國民黨戰敗來臺後，一來希望求取政權穩定、抑制反政權的組織性活動，二來又想藉由進行地方選舉來攏絡民眾，以獲得統治正當性，因而扶植地方勢力，建立了威權式由上而下的恩庇侍從體制。而另一個研究典範則是社會關係網絡的理論，強調派系的文化或社會意涵（翁立紘，2015；陳介玄，1997；陳明通、朱雲漢，1992；蔡榮祥，2014；Jacobs, 1980）。此研究途徑係以傳統社會重視人與人的連結關係來出發，重視情感的聯繫。至於蔡榮祥（2014）則認爲上述兩種研究途徑仍有不足，而提出「政治密友主義」這個替代性的分析架構，以補充上述兩個傳統理論。

二、恩庇侍從主義

首先，由縱向關係的恩庇侍從主義來看，臺灣早期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之下，國民黨政府爲強化統治的正當性，施行地方自治與選舉即在建立本土精英正式分享政治權力的制度性設計（趙永茂，1997）。亦即國民黨透

過地方派系爲中介者，依靠「恩庇者」（patron）與「侍從者」（client）之間的利益交換作爲結盟基礎（陳明通、朱雲漢，1992）。然而，1986 年民進黨成立及 1987 年的宣布解嚴，帶來臺灣邁向民主化轉型的一個里程碑（王業立，1998：36；胡佛，1998：30；游清鑫，1996：220-221；黃德福，1992：20-25）。解嚴後有關地方派系轉型，根據趙永茂（1996：285-287）的觀察，自 1986 年開始的民主化及與其相關的社經發展趨勢衝擊到臺灣地方派系逐漸轉型。王業立（1998）的文章也指出，自解嚴以後，隨著威權體制的解構與民主轉型，地方派系與國民黨之間的互動、以及地方派系本身的體質與運作方式，都產生了結構性的轉變，傳統的恩庇侍從結構已無法完整解釋解嚴後臺灣地方派系的運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國民黨地方派系在民主化及失去政權後而走向式微，但如同陳麗雅、王業立的研究，民進黨即使擁有中央及地方執政的極大優勢，2017 年的全國地方農會改選仍難以拿下 1/3 席次，顯見農會系統仍由國民黨地方派系所掌握（2019：141-144）。儘管侍從主義的結構越來越不穩定，但在民主轉型後地方派系還是能存活，因爲它具有韌性與調適能力。由此觀之，農會系統之椿腳，在民主轉型後仍具有恩庇侍從主義之縱向關係。

三、肯定說與否定說

前文提到肯定說與否定說（陳麗雅、王業立，2019），肯定說認爲地方派系已經瓦解之學者如王金壽，提出了地方派系正在崩壞或已瓦解，筆者則是認爲地方派系就算走向滅亡也會努力求生，派系存亡的關鍵可能就在椿腳的轉型與否。王金壽（2004a）以屏東縣地方派系爲研究個案，認爲地方派系正在瓦解，因爲屏東地方政治人物不認爲地方派系還存在於屏東，也不認爲自己是地方派系人物（2004a：202）。該文亦提出地方派系瓦解的幾個因素也是很值得吾人重視的：(1) 現代化理論：都市化較快的地區其地方派系會較先瓦解；(2) 制度論：選舉制度的改變，單一選區多席次讓選舉競爭更激烈，同黨同志爭奪椿腳資源；(3) 地方派系領導權的傳承：不見得都成功順利；(4) 民進黨的成立：讓國民黨員有了成功叛逃的機會（2004a：196-197）。王金壽（2007）另一篇文章結論也提到，對於地方派系而言，派系內部的衝突比起黨對黨、派系對派系的衝突還要嚴重，因爲它牽涉到爭

取派系內部一個重要資源：樁腳，也因此常導致地方派系的分裂與瓦解（2007：44）。因此筆者認爲，王金壽所指出的派系爲爭取「樁腳」資源，可作爲研究派系轉型的一個重點。

另外一些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爲地方派系並未消失，只是正在轉型，指出侍從主義的結構越來越不穩定，因此有朝向「山頭化」發展的趨勢，張佑宗、盧信宏（2014）的文章認爲臺灣的侍從主義雖然建立在威權主義的基礎之上，但在民主轉型後也能「存活」（survival），它具有「韌性」（resilience）與「調適能力」（adaption）（張佑宗等，2014：3）。否定說指出地方派系雖走向零碎化、山頭化，但有韌性去調適，與筆者認爲地方派系爲求生存而走向轉型的觀點，亦有相同之處。本文將在討論社會關係網絡、政治密友主義、半侍從結構與新侍從主義之後，於七、派系與樁腳互動模式變遷的檢驗標準一節中，接續討論重要的派系與樁腳存亡之檢驗標準。

四、社會關係網絡

其次，前文已提到另一個研究典範是社會關係網絡的理論，係以傳統社會重視人際網絡及情感的聯繫來出發。本文梳理社會關係網絡，發現有兩種類型，其中一種如吳重禮（2002）所述派系起源是「由下而上」自然形成的，亦即派系的存在與發展模式有其自發性因素（2002：84）。[1] 與此觀點接近的還有蔡榮祥（2014）、翁立紘（2015）等，但此種論述著重「派系」及派系領袖本身，對於「樁腳」則較少觸及。至於第二種社會關係網絡之論述，如陳介玄（1997）則將樁腳與派系共生的情形，從同心圓最內層的「派系網絡」向外擴展至「樁腳網絡」，再滲透至「俗民網絡」，將地方派系發展的社會意涵有更完整的描述。[2] 綜上，本文亦採取與陳介玄相近之觀

---

1 請參考吳重禮（2002）一文之頁碼 84 之表一，派系起源係因「由下而上」自然形成，亦即派系的存在與發展模式有其自發性因素，諸如地方鄉紳勢力的延伸、宗教慶典鄉民人情關係的延續、個人經濟生活缺乏安全感故尋求集體交易、私人械鬥與地方菁英恩怨糾葛、自我族群認定的對立與衝突等。

2 請參考陳介玄（1997：32-49）將派系與樁腳，以更完整的體系觀之，認爲臺灣地方派系的組成可分成三個向外擴展的同心網絡。最內層是「派系網絡」，成員爲派系菁英及

點，認爲相應於派系網絡所扮演的發動機角色，樁腳網絡則扮演著重要的傳動機與工具機的角色，來進行估票、固票及催票等深耕地方的工作。而派系與樁腳之間並不是上下支配的關係，而是一個既和諧又衝突、既聯合又競爭，既平靜又緊張的關係（1997：37）。

五、政治密友主義

「政治密友主義」則是在傳統「恩庇侍從」及「社會關係」兩種研究途徑，在民主化、都市化等因素逐漸產生雙重不確定性，所提出的一個替代性的分析架構（蔡榮祥，2014：47）。「政治密友主義」（political cronyism）是將派系與政黨、或派系本身內部上下關係轉化爲平等的密友關係結盟，指出結盟雙方資源將互有消長，彼此之間時而緊密，時而鬆散，或有所競爭與衝突，並具備終止結盟或重新結盟的彈性，也區分出穩固與脆弱兩種密友關係（莊卓穎，2015：150）。蔡榮祥以嘉義縣地方派系爲研究個案，於結論中提出：(1) 地方派系的組織運作並非是金字塔模式，其形成重大決定時，須與派系大老共同商量；(2) 派系成員的身分流動，主要取決於是否掌握執政資源；(3) 執政派系不可能贏者全拿，非執政派系會漸漸萎縮但不會完全消失；(4) 派系的領導繼承對於派系的大小會產生影響（2014：47）。綜上觀之，若以該研究對照高雄市，第一項之非金字塔型結構且重要決定需與大老商量應很接近，但是第二、第三項則都與執政資源有關，高雄市這二十多年都不是國民黨執政，難以掌握各種資源是事實，故難以符合。

六、半侍從結構與新侍從主義

再來，從民進黨於 2000 年首次取得政權，至 2016 年二次執政後，迄今已完全執政，民進黨是否亦建立屬於自己的侍從主義？丁仁方（1999）的文章提到：地方派系轉型的結果造成「半侍從結構」（Semi-Clientelism）的出現，丁仁方暫沿用 Jonathan Fox 所稱的「半侍從結構」（Fox, 1997: 397），

派系領袖；外層是「樁腳網絡」，成員是在各階層各領域的領導幹部，各有其人際網絡及異質化「流動」之特性，他們可能是村里長、農會總幹事、宗親會理事長、中小學校長、大學教授、家長會長、地主、宮廟管委會委員、工廠老闆……等三教九流；「俗民網絡」則在最外層，指的是能被派系有效動員的大眾。

指出半侍從結構與威權侍從結構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的恩庇主喪失了強制侍從者順服的能力，爲了減少因強制力降低所流失的支持，恩庇主必須增加物質上的誘因以繼續吸引原有侍從者的支持，同時也必須擴大「社會公民權」（social citizenship）的開放以吸收新的支持者（丁仁方，1999）。丁仁方、趙卿惠、李依霖（丁仁方等，2018）的文章則提出了綱領式政策的侍從體制，並以民進黨長期執政的臺南市爲例。丁仁方等指出，近年一些研究發現，民進黨在地方基層經營選區的方式，多少吸收國民黨過去跟選民連結的經驗，除了標的目標針對一般選民的「綱領式政策」（programmatic policies），另外也有政策標的目標爲特定選民，且有一定選票回饋效益的「侍從式政策」（clientelist policies），包括社區營造經費補助、敬老津貼發放、社區關懷據點設置、一里一活動中心興建、老人全口假牙補助等等（湯京平、陳冠吾，2013；趙卿惠，2017）。尤其賴清德的老人全口假牙補助政策，形式上接近綱領式政策，不過在運作上是透過牙醫師公會進行操作，也對每一位接受補助的老人持續追蹤，以掌握選票回饋的情形（丁仁方等，2018：70）。這和賴清德任內，臺南市合併升格區長改爲官派，讓鄉鎮市長消失且議會議員席次減少，全縣型的派系不復見等有關。此時就如同學者 Kitshelt 與 Wilkinson 指出，現代化和政經丕變使得侍從者有了更多的選擇（丁仁方等，2018：64；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本文檢視丁仁方等人文中提到侍從者這種更多的選擇，正表示難以維繫原有縱向的侍從關係，反而是增加了橫向的選擇性與不確定性。且牙醫公會具有自主選擇性，與侍從主義之垂直聽命於恩庇主亦不符合；若從對象來看，牙醫公會與免費安裝全口假牙的老人之間的關係，也和農會、水利會、黨工等不同，不是傳統樁腳；再從侍從主義之對偶關係的組成來看：國民黨／地方派系，賴清德市長／牙醫公會，也不符合。小結以上，一些學者們認爲民進黨在多年執政之後，如同前述臺南市歷任市長的侍從式連結，可作爲民進黨新侍從主義的代表。而筆者觀察同爲民進黨多年執政的高雄市，似並未有研究指出具有與臺南市類似之情形，推測高雄市並無綱領式政策的新侍從主義。

七、派系與椿腳互動模式變遷的檢驗標準

本文於前言中已述及，將嘗試以王金壽（2004a：184-188）文章中檢驗派系與椿腳變遷的標準：(1) 派系內部協調溝通及分配資源的能力（縣級派系是否有明顯領導人物）；(2) 派系領導權的問題（縣級領導人是否得到鄉鎮級的認同支持）；(3) 縣級與鄉鎮級的上下動員關係（是否保持穩定的聯盟關係）。該研究以此檢驗屏東縣級派系張、林兩派幾乎都難以達到，可見已「名存實亡」。本文亦嘗試以此標準檢驗高雄市國民黨市派與縣派之派系與椿腳的變遷，本文透過文獻整理及媒體報導有以下推論，待後續訪談資料整理後再驗證：(1) 派系是否有明顯的領導人？市派從前之雙派系爲「本地派」（四大家族）及「移民派」（澎湖派、臺南派和屏東派），後來「本地派」弱化，推測以「陳家」○○○爲北高雄領導人；「移民派」則是澎湖派、臺南派仍維持運作，且臺南派居優勢，推測以前議長許崑源爲南高雄的領導人。至於縣派，現在紅派幾近式微，推測白派的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就是縣派眾所皆知的領導人。(2) 市派縣派領導人是否得到各區市議員的認同支持？市派前議長許崑源人稱「奧援」，推測是各選區國民黨議員支持認同的領導人；縣派國民黨議員紅白派均以「尊王」爲主，亦稱爲「王派」，推測縣派各選區市議員都支持王金平。(3) 市級與各行政區級的上下動員關係（是否保持穩定的聯盟關係）我們由 2014 年與 2018 年地方選舉的結果，推測市派和縣派領導人所下達之動員指令，是能達到穩定的聯盟關係，選票有開出來。整體而言，推測市派縣派雖然都走向山頭化，但市派椿腳仍有相當韌性去爭取選票的極大化，市派議員席次在合併後仍能領先民進黨，相對的縣派席次在合併後變成落後民進黨而顯得弱化。這些透過檢驗標準所得之初步推論，將於後續地方政治菁英等之訪談後再提出驗證。

參、高雄市地方派系與椿腳

一、市派地方派系與椿腳

回顧高雄市市派（指原高雄市）的地方派系，趙永茂（1996）認爲是臺灣地方派系較爲少見的「多派系」（三派系或以上，multi-faction pattern），

其他的地方縣市在權力結構均衡下，多以「兩元派系」（bifaction pattern）爲常見。早期高雄市地方政治由高雄在地派（陳家朱家王家黃家等四大家族）及外來移民派（如澎湖派、臺南派……）及外省派等掌握，並以競逐市長大位爲目標。但後來的市派則泛指「在地派」與「移民派」爲廣義之雙派系主義。[3] 民主化之後，直轄市長 1994 年開始民選市長不再官派，第一屆由吳敦義當選，第二屆 1998 年由民進黨謝長廷搶下市長寶座，之後的高雄市即成爲民進黨長期執政。儘管 2018 年由國民黨韓國瑜當選市長，但在 2020 年 6 月 6 日遭到罷免;同年 8 月補選由民進黨陳其邁當選市長，2022 年獲得連任（中央選舉委員會，2024）。

綜上，由歷史軌跡來看，早期高雄市長由在地派系出任者並不多，市長幾乎都是移民派及官派空降而來，但是議長卻都是市派的在地派所掌握，即使 1998 年民進黨開始在高雄市長期執政亦然。[4] 直到縣市合併後第二屆地方選舉，2014 年太陽花學運之後，陳菊爭取連任獲得近百萬票高票當選，這股氣勢連帶使得民進黨在議會席次過半且由康裕成當選議長，有研究認爲當時陳菊的政治魅力已達巔峰，甚至形成以市長爲核心領導之勢，因此高雄地方派系盛況不再（莊卓穎，2015：7）。但筆者於高雄市長期觀察，儘管地方勢力弱化，但派系依舊存在，樁腳運作仍舊以里長、宮

---

3 回顧高雄市自有選舉市長以來，一開始是澎湖派勢力龐大，由謝掙強當選第一二屆市長，第三屆臺南派得到在地派陳家支持下，由陳武璋當選。至此，國民黨不願外來移民派再坐大，乃採取「分而治之」輪番提名策略，徵召在地派陳家陳啓川出馬，第四屆及第五屆均由陳啓川擔任市長，這時應可視爲廣義的「雙派系主義」，也就是外來移民派與高雄在地派之爭。接著，第六屆由臺南派楊金虎當選，第七屆在地派王家王玉雲當選並連任第八屆。1979 年高雄市升格院轄市，王玉雲成爲首任的官派市長（曾權林，2005：75-76）。但接下來的官派市長幾乎都是空降而來，應該是國民黨有意壓制地方派系的時期，官派市長包括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除許水德外都是外地空降。

4 以直轄市長第一屆（1981 年）至第四屆爲例，皆是由陳家陳田錨擔任議長，是眾人眼中德高望重的老議長。至民進黨執政（1998 年起）的時期，在地派四大家族走向式微，王家朱家都官司纏身，陳派的黃昭順仍掌控北高雄市派，此外黃家仍有政壇香火。在地派與移民派此時必須有更多的合縱連橫，且爲保障市派的整體利益，必須繼續掌握議會多數席次及議長寶座，歷屆當選議長者如黃啓川（黃家）、朱安雄（朱家）、蔡見興（澎湖派）、莊啓旺（澎湖派）、許崑源（臺南派）等。

廟、宗親會、同鄉會及農會、水利會爲主，至今仍以爭取議員席次及議長位子爲派系最重要目標，努力轉型以求生存的意志是相當堅韌的。

二、縣派地方派系與樁腳

縣派（指原高雄縣）地方派系爲人所熟知的是傳統三派：白派、紅派及黑派（丁仁方，1999；趙永茂，1996）。所謂得三山得高雄，指的就是傳統岡山白派、旗山紅派及鳳山黑派三大派，這三派的代表人物，白派最初是陳新安、林淵源，現在是王金平；紅派早期是洪榮華，後來是林仙保、林益世父子；黑派則是民進黨余家班及後來楊秋興（楊派）。白派主要掌握了原高雄縣農會，僅鳳山農會屬於黑派。紅派所掌握的是高雄縣的各個水利會（徐兆霖，2011：85-86）。後來紅派林益世因涉貪而導致衰落，現在維繫國民黨在原縣區的，就是白派了。昔日黑派由白派分裂而來，是高雄縣最大的在野反對勢力，余登發長期扮演黨外領袖角色。民進黨成立後，余陳月瑛等余家班於是加入民進黨。余家班擔任高雄縣長共 6 屆長達 24 年，2001 年傳承給楊秋興至 2010 年，楊秋興當時將黑派的勢力擴大，有所謂「新黑派」或楊派之稱。不過在縣市合併後，楊秋興失去政治舞臺，楊派日漸沒落，原黑派則大多被菊系收編（徐兆霖，2011：103、186）。至於縣議會方面，國民黨因爲長期由白派、紅派分別掌握農會、水利會等大樁腳，儘管民進黨黑派擔任縣長多年，縣議員席次也一直是國民黨紅白派之囊中物。在廖達琪、洪澄琳（2004）的文章中，原高雄縣之「分立政府」的府會關係是朝小野大，可見國民黨地方派系亦是以掌握高雄縣議會的多數席次及爭取議長位子爲紅白派共同之目標（2004：23-30）。

三、縣市合併後的地方派系與樁腳

徐兆霖（2011）的論文指出大高雄市的合併，地方派系影響力弱化，是因爲政治市場的大幅萎縮而導致的。高雄市的市派與縣派，原就以爭取議會席次來維繫派系及其成員利益爲主，筆者查詢中選會資料庫，高雄市改制升格後之市議員選舉共有 11 選區，總席位爲 62 席（另有原住民 4 席），而原高雄市有 43 席，升格後爲 34 席，少了 9 席；原高雄縣爲 50 席，縮減

爲 28 席，少了 22 席之多，合計減少 31 席。2010 年縣市合併之前，原市區及原縣區的民進黨議員的席次都落後國民黨很多，但 2010 年合併後第一屆市議會席次民進黨竟可和國民黨打成平手。[5] 而第一屆正副議長選舉，市派臺南派許崑源於前一屆 2006 年還是無黨籍時就有意參選，但當時國民黨支持澎湖派的莊啓旺搭配無黨籍黃石龍當選正副議長；至第一屆時，國民黨推出市派的臺南派許崑源搭配縣派白派的陸淑美，許崑源順利拿下議長，副議長陸淑美和民進黨蔡昌達投票兩次票數相同，最後抽籤由蔡昌達勝出（徐兆霖，2011：224-225）。

合併後第二屆 2014 年及 2018 年第三屆的地方選舉，在臺灣地方選舉史又掀起波瀾，在此將合併前一屆及合併後一二三屆之市議員席次變化做一比較如表 1 所示。第二屆民進黨得 32 席，首次席次過半（51.6%），[6] 正副議長亦由民進黨康裕成、蔡昌達雙雙當選，筆者推測這應與陳菊連任拿到超高票數 993,300 票有關。2018 年第三屆市議員選舉，國民黨地方派系在韓流激勵之下多有斬獲，原市區國、民兩黨分別爲 16 : 13；原縣區則爲 14 : 12；合計國、民席次爲 30 : 25。與第二屆相較，國民黨由 23 席增加 7 席，其中市派增加 3 席，和民進黨相較由 13 : 16 變成 16 : 13，成功翻轉回來；而縣派紅白兩派在白派領袖王金平整合下，也增加了 4 席。議長選舉方面，市派許崑源再次回到議長寶座，縣派陸淑美則當選副議長，媒體報導大多指稱是許崑源的復仇成功。

---

5 以合併前一屆來看，原市區 2006 年國、民兩黨分別爲 21 : 16；原縣區 2005 年國、民兩黨爲 25 : 16；合計國、民席次爲 46 : 32。但 2010 年民進黨對國民黨，27 : 27 平手（國：市 15＋縣 12；民：市 14＋縣 13），再加上原住民席位後，國民黨才以 29 : 28 領先一席。尤其在原縣區，在合併前比民進黨多 9 席，到合併後竟然還少民進黨 1 席，可見此時縣派的紅派白派已趨於劣勢。

6 2014 年第二屆市議員席次，原市區國、民兩黨席次分別爲 13 : 16；原縣區則爲 10 : 16；合計國、民席次爲 23 : 32。

表 1 高雄縣市合併前一屆與合併後第一至第三屆市議員選舉政黨席次比較

合併前一屆（高雄市 2006 年、高雄縣 2005 年）						
縣市 /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臺　聯**	**無黨籍**	
高 雄 市	21	16	1	1	4	
高 雄 縣	25	16	1	0	8	
合併後第一屆（2010 年）						
縣市 /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臺　聯**	**無黨籍**	
大高雄市	27	27	1	0	7	
原 市 區	15	14	1	0	4	
原 縣 區	12	13	0	0	3	
合併後第二屆（2014 年）						
縣市 /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臺　聯**	**無黨籍**	
大高雄市	23	32	1	1	5	
原 市 區	13	16	1	1	3	
原 縣 區	10	16	0	0	2	
合併後第三屆（2018 年）						
縣市 /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臺　聯**	**無黨籍**	**時代力量**
大高雄市	30	25	1	1	3	2
原 市 區	16	13	1	1	2	2
原 縣 區	14	12	0	0	1	0

說明：合併後大高雄市共有 11 選區，席次 62 席；另有原住民席次 4 席未計入。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24)。作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高雄市國民黨地方派系於縣市合併及太陽花學運衝擊之後，危機感日益增加，市派與縣派更加重視與樁腳的密切合作，市派雖然走向山頭化，但主要樁腳不變，仍以基層里長、地方宮廟、宗親會、同鄉會及農會系統爲主。這長期建構的市派，至今仍努力爭取市議員席次及議長位子，且有相當的堅韌性。國民黨縣派，因爲陳菊市長在縣市合併後以各種資源挹注至原縣區，民進黨黑派、楊派被吸納而式微，國民黨紅、白派也被壓縮，但傳統上白派掌握農會、紅派掌握水利會，並未改變。[7] 在

[7] 當媒體紛紛報導陳菊「市長派」的影響力，指出：如今已沒有謝系、沒有新潮流系，

後面章節討論中，會再以深度訪談加以驗證。

四、基層樁腳在傳統樁腳金字塔中最為重要

本文研究之重點，聚焦於地方派系與樁腳在地方選舉中的動員關係，尤其是樁腳的重要性，因爲樁腳在橫向關係更爲多元情形下容易有流動。本文綜整代表性學者的研究，包括王金壽（2004b）、陳華昇（1993）、陳介玄（1997）、丁仁方（1999）及張佑宗、盧信宏（2014）等。王金壽（2004b）研究 1993 年縣市長選舉和 2000 年總統選舉，提到基層樁腳是選舉動員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角色，樁腳雖然在最下層但他是最具社會關係的動員基礎。[8] 基層樁腳要負責拜訪選民、拉票及回報選情，以及投票當天的催票和送錢、買票。而基層樁腳篩選的原則，是以最親密的社會關係爲主，包括朋友、兄弟、叔姪和鄰居等，以準確掌握票源、保障基本票數和降低買票被抓的風險（王金壽，2004b：115）。王金壽文章中，針對 1993 年縣市長選舉的買票是基於 (1) 由上而下，(2) 組織化，可說結構嚴密且有效，但儘管如此，王金壽仍針對 1993 年樁腳於選舉動員中遇到的困難，做了以下歸納：(1) 樁腳數目的有限性；(2) 樁腳的能力不足；(3) 派系衝突；(4) 派系網絡和樁腳網絡的重疊性；(5) 吃錢問題；(6) 動員負責人難尋；(7) 有限的買票金錢（王金壽，2004b：115-120）。而陳華昇（1993）則以縣級派系結構的層級來看樁腳，最上層爲派系領袖，其餘各層樁腳則在社經組織各據其位，而形成一個金字塔型模式。第一層爲各鄉鎮具相當知名度，或經營龐大事業或長期擔任重要公職或農會重要幹部；第二層爲在各鄉鎮具相當知名度，任公職或農會總幹事者；第三層則是在村里中有知名度或鄉鎮市民代表、鄉鎮農會理事等；最基層則包括村里長、鄰長、農會代表、小組長等（丁仁方，1999：66；陳華昇，1993：20-25；趙永茂，1996：46）。

大家都統合在「菊系」、「英派」之下。而紅、白兩派與黑派已式微，恐怕只能影響層次更低的市議員及水利會與農會系統，難以扭轉大局（王家俊，2019）。

8 王金壽（2004b）以 1993 年縣市長選舉時，某鄉鎮的候選人競選後援會爲例，最上層結構爲會長 1 人、副會長 7 人、顧問 12 人及執行幹部 2 人，接下來是該鄉鎮各投開票所正副負責人各 1 人，在下來則是各投開票所的基層樁腳各若干人，平均每一基層樁腳負責選民數是 20.6 人（2004b：107-111）。

這樣的觀點，與陳介玄相當接近，只是陳介玄將樁腳網絡向外滲透至俗民網絡而顯得更爲完整，陳介玄（1997）認爲臺灣地方派系的組成可分成三個向外擴展的同心網絡。最內層是「派系網絡」，成員爲派系菁英及派系領袖；外層是「樁腳網絡」，成員是在各階層各領域的領導幹部，各有其人際網絡及異質化「流動」之特性，他們可能是村里長、農會總幹事、宗親會理事長、中小學校長、大學教授、家長會長、地主、宮廟管委會委員、工廠老闆……等三教九流；「俗民網絡」則在最外層，指的是能被派系有效動員的大眾（1997：32-39）。由此結構可以看出「樁腳網絡」是派系能有效運作的關鍵，樁腳有如利益的「掮客」，透過特殊化的人情連帶關係媒介利益交換，獲取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及象徵利益（如派系領袖參加民眾的婚喪喜慶活動）。對此，丁仁方也認爲「樁腳網絡」事實上又滲透到其他統合化的社會及政治組織，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地方派系不只縱向垂直整合，而且也橫向向外擴散（1999：65）。本文亦依據陳介玄的社會關係網絡觀點，將於後續篇幅中以訪談結果來驗證「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的同心圓運作。

再者，張佑宗、盧信宏（2014）指出民主化之後侍從主義並未消失而是在調適，並觀察到樁腳的變化，將之分類爲三種：理念結合之樁腳、利益結合之樁腳，或中間選民觀點之樁腳。他還提到即使是中間選民，也可能因爲人情世故或利益因素而游離選票，並舉例即使是在雲林縣最爲都市化的斗六市，較能夠拒絕社會關係網絡影響和侍從主義交換的，也只有市中心的住民。指出聯繫樁腳與選民之間的仍是以人情關係爲主，且越是鄉下、邊陲的地方，越是注重傳統人情關係，這也和黃德福（1994）的看法相同，現代化愈高的地區，派系的影響力愈低。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樁腳轉型亦有「都市型」與「邊陲型」的部分差異。本文亦將於訪談資料整理後加以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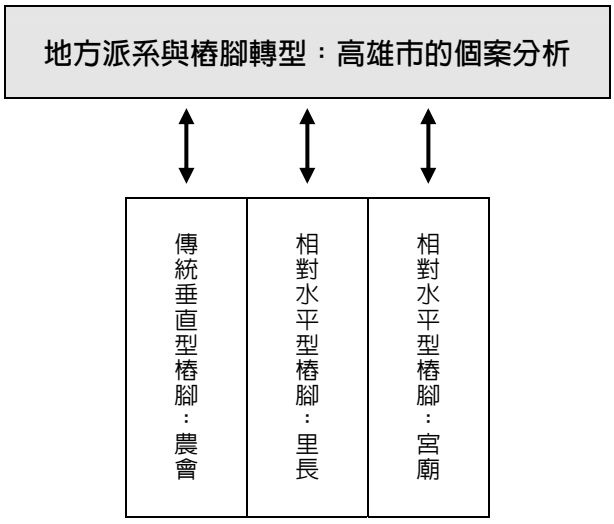
肆、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高雄市地方派系與樁腳轉型爲研究對象，並以縣市合併後市議員選舉爲研究範圍。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是依據文獻分析所檢視的高

雄市地方派系轉型後的三種代表性樁腳：傳統垂直型以「農會」爲代表，相對水平型則有「里長」和「宮廟」兩種，將以深度訪談法蒐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來加以驗證。並以立意抽樣和滾雪球的方法，找出最適合研究目的的受訪對象（見附錄1）。

一、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深度訪談法，訪談熟悉高雄市地方政治的耆老及政治菁英，並基於研究倫理以匿名處理，且不收錄完整訪談全文。訪談期間分兩部分，分別是高雄市第三屆（2018）及第四屆（2022）地方選舉期間；訪談地點，包括政治菁英之服務處或競選總部、里長辦公室、學者教授之研究室及咖啡廳等；訪談時間長短大多爲 1～2 小時；每位受訪次數爲 1～2 次。總計訪談對象計 22 人，分類如下：(1) 市議員：8 人，代碼 C。(2) 學者：大學教授 2 人，代碼 P。(3) 記者：熟悉地方選舉之資深記者 1 人，代碼 R。(4) 立法委員：2 人，代碼 L。(5) 里長：6 人，代碼 V。(6) 地方仕紳（含宮廟等）3 人，代碼 G。訪談對象類別及背景簡述如附錄 1。

伍、派系與樁腳互動模式的變遷

本文於訪談多位地方耆老、政治菁英及學者等之後所得之寶貴資料，對照先前以王金壽（2004a：184-188）文章檢驗派系與樁腳變遷的標準，來驗證派系歷經弱化、山頭化變遷之後，派系與樁腳的存在與轉型是息息相關的，本文得到以下之驗證：

一、派系確實仍有明顯的領導人

受訪者多人表示，「本地派」之四大家族，現在「陳家」代表人是前立委○○○，她也是公認北高雄市派之最大山頭；至於「黃家」仍有○○○和○○○擔任市議員，「王家」「朱家」則早已淡出政壇。而「移民派」現在還有澎湖派、臺南派在運作，臺南派前議長許崑源則雄踞在南高雄，並有整合全市派的實力。縣派方面，白派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具有全國性之知名度，也是整合紅白兩派的重量級人士。一位地方耆老談到○○○縱橫政壇數十年，如此說：

> 您問到高雄市市派有沒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是有領導力的？我認爲○○○是北高雄最有影響力的啦！她掌握多少市議員你知道嗎？以她的選區來講，幾乎每一位國民黨籍市議員提名都要經過她認可或支持，都是她的人，而且都是娘子軍。哈哈，男生在這選區很難出頭了。除了市議員是她的大樁腳，還有宮廟（新庄○○殿）、彰化同鄉會、黃氏宗親會、里長等這些樁腳的支持。對北高雄甚至整個市派來說，她是眾所公認的在地派派系領導人。（G1）

二、派系領導人仍得到各區市議員的認同支持

前文已說明市派之在地派以○○○爲公認之領導人，並獲得她的選區市議員及里長等的支持。透過受訪者驗證，談到市派另一派移民派之領導人，之前有澎湖派之莊啓旺與臺南派許崑源之爭，後來許崑源爲人海派人稱「奧援」，得到更多支持而成爲南高雄共主，進而在全市各選區市議員支持之下，兩度成爲議長。縣派方面，也得到受訪者驗證，指出國民黨議員

紅白派均「尊王」而形成所謂「王派」，依舊掌握著農會、水利會等系統，但面對與市派的競合關係，更需要王金平出馬方有可能協調整合。我們也引述一位資歷三十餘年市議員的說法：

> 北區是在地派〇〇〇的天下，南區就是移民派莊啓旺和許崑源之爭，臺南派後來還是大過澎湖派，這當然和許崑源人稱「奧援」的性格有關。許崑源往生後，臺南派由黨部幹事長曾俊傑出面推曾麗燕補選議長，挑戰莊啓旺結盟縣派（白派）推出的陸淑美，後來在縣派共主王金平出面後得到整合，曾麗燕得以代表國民黨參加補選議長成功。（C7）

他又補充說明：

> 陳菊擔任合併後大高雄的市長後，原縣區黑派余家班和楊派幾乎都被她收編了，我們國民黨白派紅派在議員席次大幅減少之下力量也被削弱。當縣派合併進入大高雄市議會之後，議會結構仍是市派所掌握，也就是移民派和本地派。縣派議員在派系弱化之下，再加上本來就沒有甚麼次級團體，很自然的就會與他們（市派議員）結合。（C7）

三、市級與各選區的上下動員仍有尚稱穩定的聯盟關係

受訪者大多表示，由 2014 年與 2018 年地方選舉的結果，看得出市派和縣派領導人所下達之動員指令，幾乎都能達到穩定的聯盟關係，尤其是 2018 年，國民黨推出韓國瑜參選市長，得到市派〇〇〇、許崑源等派系山頭領導人之支持，更得到縣派王金平登高一呼的三山造勢成功，凝聚了大小椿腳，開出了超高選票而當選。各選區市議員也選得相當好，席次過半，許崑源、陸淑美因而雙雙當選正副議長。然而受訪者亦指出，2020 年韓國瑜遭罷免後，許崑源往生，也衝擊到國民黨市派與縣派，有些議員出現跨派系合作的情形，本文認爲未來可再觀察或作更深入之探討。一位資深重量級市議員如此說：

> 國民黨市議員原本相當團結，在許崑源議長及王金平院長整合之下，動員令下達就會共同努力，在 2018 年我們打了漂亮的一仗。但可惜韓市長 2020 年被罷免，許議長也走了，多少影響到我們。我們市議

> 員大致分爲 3 派：(1) 議長派（挺曾派）：以市派的臺南派爲主，因爲許崑源、曾麗燕就是臺南派，市長陳其邁的出身也是臺南派，所以其中也有人是親邁派。主要成員有曾○○、陳○○、劉○○、李○○、李○○、陳○○、陳○○等；(2) 副議長派（挺陸派）：以縣派的白派爲主，說明白一點，就是以尊王（王金平）爲主（王派），所以市派議員中和農會走得近的也會加入，例如李○○、李○○、陳○○、黃○○、鍾○○、蔡○○、蔡○○（這 7 位也是 KK 連線的），另外還有吳○○；(3) 中間派：一些資深議員，像我也是。（C8）

綜上小結，儘管目前市派縣派市議員偶有出現跨派系合作的情形，但依據前述王金壽派系與椿腳變遷後是否仍存在之標準，驗證後我們可知高雄市市派、縣派的結構尚稱穩定存在。不過臺南派在掌門人許崑源往生後，他的妻子林絲娛扶植女兒許采蓁繼續參選 2022 年市議員，並得到韓國瑜等人支持，在第八選區以最高票當選。臺南派在曾俊傑出走後，曾麗燕前議長與林絲娛、許采蓁的結盟關係會如何發展，我們可以後續再作觀察。北區在地派這邊，陳家○○○依舊穩定領導，而左楠區因人口增加多了一席市議員，由 8 席增爲 9 席，她所支持的 4 位女將全數當選：白喬茵（最高票）、陳麗珍、李雅芬、陳玫娟。另一位市議員李眉蓁則較特殊，她屬於農會系統，且有宮廟（蓮池潭城隍廟）及楊氏宗親會（夫家）的支持，但亦尊○○○爲共主。縣派方面，依舊以尊王爲主，王派幾乎取代了原來的白派和紅派，是無可質疑的。至於市派與縣派兩者地方勢力的消長，我們可從議會龍頭之爭來看，市派臺南派許崑源擔任了第一、三屆議長；而縣派則一直沒有機會。2020 年補選議長提名時，國民黨派系鬧得風風雨雨，還需白派領袖王金平親自出面促成「大團結」。也就是說，維護高雄市整體派系的利益及命脈是最爲重要的。筆者亦據此推測這和陳麗雅、王業立（2016）的文章有許多相同也有不同之處，相同的是該文亦是探討縣市合併後的市議會運作，且都是由民進黨執政而國民黨地方派系掌握議會及議長，不同的是該文以議會之次級團體運作爲主，且是縣區合併了市區；而本文則發現高雄市縣派之紅白派被弱化而必須與市派合作。筆者亦希冀能拋磚引玉，期望更多學者能重視高雄市地方派系和椿腳變遷與轉型更深入的研究。

陸、樁腳轉型的類型與特質

經過與地方耆老和政治菁英的深度訪談所獲致的第一手資料，本文分析整理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大都表示地方選舉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派系中的樁腳，而民主轉型後的基層樁腳最具代表性的類型有三種，一是農會樁腳；二是里長樁腳；第三是宮廟樁腳。本文研究發現轉型後的三種樁腳類型並分析其特質，以下則依序說明：

一、農會類型及特質

(一) 特質 1：金錢取向、利益取向

農會，是特殊性民間團體，但需具有農民身分，故難以拓展會員數，近年來又受到工業化、都市化等因素影響而農地減少，農民數亦日漸減少，如表 2 所示，據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網站統計，民國 102 年底農民數還有 91,829 人，至 110 年底竟少了兩萬人之多，只有 7 萬多人（70,463），但有趣的是「贊助會員」的團體反而增加很多。受訪者說，農會有他自己的資金流動，派系頭人掌握了這些資源，下面的樁腳結構樣態就很穩定，組織依舊很嚴密，以保障派系所有人的利益。

表 2　高雄市農會縣市合併後會員數統計資訊（民國 102 年至 110 年）

年　　度	正會員數（人）總計	贊助會員數個人（人）	贊助會員數團體（個）
102 年底	91,829	183,145	134
103 年底	88,048	184,528	148
104 年底	83,978	181,292	158
105 年底	80,728	181,357	167
106 年底	78,375	177,088	178
107 年底	76,113	175,637	189
108 年底	73,890	175,064	206
109 年底	72,129	174,708	222
110 年底	70,463	174,877	235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農業局（2024），作者自行整理

一位知名學者受訪說：

> 農會金流當然是金權政治的一環，這和地方派系關係密切。而派系是依附在執政者的權力和資源之下，以前不用說就是國民黨，但這些年是綠色執政，相信市長有一定的影響力，農會系統可能須與之交換利益。(P1)

一位出身農會系統的資深市議員說：

> 農會系統由上而下透過理監事、代表及小組長層層下來，讓他的員工動員起來。總幹事就是主要負責的人。他們的動員，包括吃吃喝喝。這也和農會有信用部有關，這個信用部就是個大金庫。所以把持農會的，幾乎財源都被他掌握住，跟著派系頭人走，大家都吃香喝辣。(P2)

確實，若依恩庇侍從理論來看，失去了國民黨這個恩庇主，地方派系理應消失瓦解才是，但如前提及陳麗雅、王業立(2019)的文章，民進黨儘管極具執政優勢，面對 2017 年的全國各地農會改選，仍無法拿下三分之一的席次。本文亦有同樣看法，受訪者多人表示，正因爲農會會員人數的逐年減少，爲了整個派系的利益考量，勢必固樁綁樁抓得更緊，爭取「贊助會員」也相形重要，這一定涉及複雜的利益關係。

(二) 特質 2：以派系網絡為主

趙永茂等（1994）研究指出，雖然臺灣已民主化，但民主化後金權政治盛行，國民黨與地方派系長期合作，選舉則依賴組織戰，透過包括賄選在內的特殊利益輸送，將選票的與動員建立在組織網絡上，特別是派系所掌握的農、漁、水利會等社會組織。一位地方耆老、資深無黨籍里長如此說：

> 舉例來說，〇〇〇議員是政二代，他的父親長期擔任果菜公司總經理，是派系頭人，掌握了農會系統，一方面由產銷系統動員，另一方面就是農會組織系統，掌握信用部金流，並往下動員總幹事、代表、小組長到會員，以及會員家屬等。(G1)

> 原縣區一向是白派的勢力，到現在雖然因爲陳菊的政治影響力而削弱，但正因如此，白派所屬農會椿腳更因此畏懼走向瓦解，相對的垂直面抓得更緊，農會選舉一定要贏，贏了才有派系資源。對於民進黨執政的壓力，則採取擴大結盟以求生存。（C7）

小結以上，受訪者表示，到目前爲止農會在地方選舉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如黃德福、劉華宗（1985）所說，農會扮演過多的政治角色，爲政黨或地方派系候選人積極輔選而成爲選舉時的超級椿腳。受訪者說，雖然高雄市農地減少，農民數也比以前少，但農會系統依舊有其系統，由派系頭人下達指令，產銷系統和農會系統開始動員，並推出派系、山頭的代表參選市議員，且幾乎都能當選。

(三) 特質 3：由上而下的互惠模式

續上，如同趙永茂等（1994）所指出，農會在選舉動員時的組織戰有其傳統特色，也如同陳麗雅、王業立（2019）的研究所述，農會至今仍難被民進黨攻破。一位熟稔地方政治運作的教授所說的與前述市議員的說法也相當一致：

> 農會一直有其由上而下的運作模式，從理事長、總幹事往下一層一層組織嚴密，因爲這涉及金流及資源。我自己學生參選議員，跟我說農會派的候選人很可能買票，他們也盡量避開在選舉期間時給錢（選罷法），會用其他方式在平時就固樁。但若是選情危急，還是會把錢交給下面的椿腳來搞定。（P2）

綜上，受訪者認爲農會擁有完善且獨特的組織系統，得以在選舉時動員爭取選票。原縣區農會大多掌握在國民黨白派手中，而原高雄市從傳統國民黨一黨執政，到民進黨成爲執政黨後的危機感，農會爲維護其利益與資源，避免派系崩解而由上而下將椿腳抓得更緊，可以從上述 2017 年農會選舉結果得到證明。

二、里長類型及特質

(一) 特質 1：選票取向，以經營選區服務換取選票

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里長在選舉動員上昔日角色是垂直型之最基層樁腳，以「責任里」之區分來進行選舉動員。時至今日，國民黨兩度失去中央執政權，早已不復當年的豐沛資源，受訪者說，現在的國民黨里長在選票經營上須以選區服務爲重，盡可能爲里民爭取資源。樁腳轉型在里長的變遷是比較大的，爲求資源而由垂直而轉爲兼具相對水平特質。

> 我個人多年里長經驗，選區服務最爲重要，選民要感受到你幫我解決了問題，例如馬路有洞、路燈不亮、水溝要清……，你有爭取到建設經費，你肯用心服務我們，才不辜負我投你這一票（或是我全家都支持你）。選區內若有比較特殊的建設需求，就會聯合同選區市議員、其他里長，甚至請立委也來幫忙爭取。（V4）

> 我們幾世代都在後勁這邊，當然親戚宗族很多，你（里長或議員）如果做人好、選區服務好，大家一定相挺，甚至宗親會、同鄉會也會來幫忙，搏感情眞的很重要。（C1）

上述引言也符合楊永年、王宏文（2017）的研究，認爲從里長的角度來看，里長係以服務里民爲優先考慮，並在連任考量之下，因此里長在乎的是其選區服務能否讓民眾有感來爭取選票，故里鄰建設服務經費的運用就變得相當重要（2017：72）。受訪者說，同派系同選區的立法委員、市議員和其他里長，本來就有縱向橫向的合作機制，來共同爭取選區所需的建設經費或資源；但若眞的有必要，也不排斥其他黨派市議員、立委等的協助。這就是本文所分析的，轉型的里長樁腳，會有由垂直轉而相對水平的互動特質。

(二) 特質 2：樁腳網絡為主，派系網絡為輔

承上，爲做到更扎實的選區服務，爭取里民所需資源及建設經費，受訪者說，國民黨籍里長可能淡化自己的黨派色彩，以爭取和各個黨籍的市議員（也可能有立委或市長）合作，作法上可以和他們成立聯合服務處，

或者在里民活動時由他們來掛名贊助。也就是橫向擴大椿腳的相對水平互動，但本身派系的利益亦要維護。

> 我的里和和隔壁的里成立了聯合服務處，擴大椿腳網絡橫向的連結，因爲只要爲我們社區好，和其他各個黨派聯合服務掛在一起也是好的。所以各黨市議員們也都來掛名，國民黨的○○○、○○○都有掛名，民進黨的○○○也有，他們對我的里和里民都有服務和幫忙解決問題，所以我也都支持他們。(V3)

(三) 特質 3：相對水平的互惠模式

續上，國民黨里長與不分黨籍提供資源的議員、立委等合作，呈現出水平互惠的情形，在市議員選舉時會採取多方押寶，一方面是要回報這些議員平日的協助，另一方面是不管誰選上都可以繼續幫助本里的里民，受訪者說，一般來講一個里長大概支持兩到三個市議員候選人。

> 其實大家都知道里長本身要是有黨籍，除了要支持他的黨，他還有自己的人脈要考慮，也就是曾幫他解決問題的各個市議員（各黨都有）。所以很多里長都不只支持一個候選人，大約都支持三個，一個藍的一個綠的，還有一個可能是他的好朋友。(C3)

再進一步分析都市型里長和邊陲型里長的有何異同，以下是受訪里長的訪談驗證：

> 傳統部落，情感因素最重要，椿腳也都是關係親近者，買票得以奏效。但新興社區改變很大，沒甚麼感情因素，尤其是集合式住宅，新型態選民也增加很多。(R1)

> 獨立選民在我們這個重劃區的大樓裡確實很多，相對的空氣票也比以前多了。年輕人普遍使用網路通訊軟體，例如 Line、臉書及 IG 等，連市長層級都在經營網路社群，我當里長也要經營臉書。(V2)

由此可見都市型里長的挑戰，在於都市重劃後新興社區的高樓大廈，自主意識高的獨立選民和所謂的「空氣票」增加。[9] 邊陲型里長還可以運用

[9] 訪談地方菁英口中的「空氣票」，大多指集合式住宅的新型態選民，人情淡薄，鄰居幾

傳統搏感情及綁樁方式，都市型則必須突破以往的行銷策略，平常就要加強與大樓主委的互動，並經營臉書、Line、IG……等社群團體，以拉近與大樓選民的距離。[10]

三、宮廟類型及特質

本文訪談中多人提到宮廟背後幾乎都有政治人物的支撐，甚至他本人就是宮廟董事長或主委。這些人以市議員居多，也有立委居於更高層，這時宮廟領袖可能同時就是派系或山頭領袖。本文也訪談到幾位政治人物身兼宮廟負責人的代表案例，茲引述如下：

其一曾擔任副議長，傳承給兒子擔任市議員，他也是兩間宮廟的主委受訪時說：

> 我們後勁的〇〇宮、〇〇宮，是我們宗族長期經營的，也是鄉親的信仰所在，大家都很團結。平常有甚麼事我都盡力去幫忙解決，到了選舉的時候，大家也都自動來幫忙我。(C1)

其二是前立委、前市議員，長期支持某宮廟受訪時說：

> 我一直支持新莊地區的北極殿，市政府說因爲種種原因預定要遷廟，讓鄉親們人心惶惶，該里〇〇〇里長和〇〇〇議員都來找我，我們就去和市府溝通，終於取得共識，尊重地方居民的共同信仰而保住了宮廟。(L2)

其三，某市議員父親是前議員也是宮廟董事長且身兼果菜公司總經理，受訪說：

乎也很少來往，大樓管委會一般也不會允許候選人進入拜票。中間選民、獨立選民相對較多。由此推論，這些新社區選民的「理性自利」，重視的是他們自己切身的利益及議題的選擇。

10 關於「都市型」與「邊陲型」之劃分，訪談者大多認爲都市區是以商業密集區及都市重劃區爲主，特色是商業活動頻繁，交通樞紐，大樓林立及集合式住宅；而邊陲區則是老舊社區或部落，農漁業活動爲主，或鄰近山海等特色。

我們家族長期經營的蓮池潭城隍廟，不只守護大家的平安，更因爲是著名的觀光勝地，我們也希望觀光客源源而來，鄉親們都能賺到錢，如何確保地方的建設及觀光資源的維護都是我一直努力的。(C4)

其四，某市議員曾任國民黨里長（當時是某前議員的樁腳），又身兼兩間宮廟主委，他的競選重要幹部兼宮廟管委會委員受訪時說：

我們右昌〇〇府及〇〇廟，在地方都是鄉親生活的重心，我們主委又身兼里長，爲地方爲信徒爲里民做了很多事，這次不以國民黨而以無黨籍來參選，是得到鄉親們共同支持的。(G2)

由以上四個代表案例，可知宮廟與政治人物關係的密切，此外，受訪者也說宮廟大多歷史悠久，長期由某宗族或家族來經營，所以宗親會在地方上常與宮廟關係綿密，也成爲宮廟的重要樁腳。以下則就宮廟樁腳之特質分析，並引述驗證如下。

(一) 特質 1：信眾情義取向、公益取向

宮廟，對臺灣各地而言，就是當地文化的信仰中心，也就是「民間信仰」的力量。[11] 受訪者表示，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宮廟以信眾情義取向、公益取向來廣結善緣，臺灣的廟埕文化就是民眾精神寄託之所在。受訪者多人表示，以社會文化觀點來看，在地宮廟與在地頭人和宗親會關係密切，頭人幾乎都是在地仕紳，以其家族力量形成之宗親會，就是家族勢力的展現，且和在地宮廟信仰有一定的連結脈絡。一位新左營蜚黃區里長將鐵路以東的地理環境與在地宮廟的文化淵源如此說：

我們〇〇〇里廟宇是有的，像新吉莊北極殿。這裡有三個里，新上、新中和新下里，就是以在地廟宇的生活和文化來區分的。北極殿：以前從左營舊部落廊後里搬過來新上里這邊；青雲宮：主要是新中里，加上新下里以前從桃子園保生大帝那邊遷移過來的。就是以自

[11] 如徐火炎（2005）提及，文化動員就是指利用共通的認同與文化價值等特性，來影響或改變個人的行動抉擇，以連結爲集體行動的一種過程。

由路爲界，以西是新中里及新下里，是桃子園人；以東，則是廍後人。這兩大廟宇就在附近，很自然的就會比誰經營的好。廟宇對選舉的影響力，對老一代是很深的，他們很有向心力，對年輕人來說就弱一些了。(V1)

一位市議員也如此說：

我是里長出身的市議員，很重視選區內每個里的里民生活和需要，在信仰的部分也非常尊重。像新吉莊北極殿，之前市府說要遷址，這裡的鄉親及宗親會都很反彈，因爲這是他們的精神和信仰中心。我向立委報告後，加上當地里長一起去溝通，後來終於不搬了。這對新上里所有老左營廍後里搬過來的親族來說，太重要了。(C6)

由上述訪談內容，我們更白話的去解釋，就是宗族住民集體遷移到另一地區，將原有宗族的信仰帶過來，在這個地區建廟奉神祭祀，這個宮廟和他們的宗親會當然是關係密切，就是他們宗族的信仰中心。這裡訪談的市議員、里長，已充分說明地方宮廟和特定政治人物及當地宗族、頭人和宗親會等的密切互動關係，宮廟面臨遷址的大事，這些立委、議員、里長都出面幫忙溝通協調，到了選舉時，宮廟和宗親會也會全力支持這些政治人物。

(二) 特質 2：俗民網絡為主，樁腳網絡為輔

臺灣宮廟的特色，是以釋儒道的融合而具有「凝聚」的特性，派系領袖透過宮廟樁腳，在廟埕所做的口語傳播，既快又廣，這就是「俗民網絡」的影響力，因此臺灣政治人物無不重視宮廟。

一位地方耆老兼資深無黨籍里長說：

宮廟方面影響力很大，更不用說左營蓮池潭旁邊那麼多宮廟，你一定要重視廟宇活動，各個大廟也都有支持的議員，城隍廟有〇〇〇，慈濟宮有〇〇〇及……等。平日廟埕裡就是社區民眾聚集，消息很容易散播出去，更不用說選舉期間，宮廟支持誰很快就會口語傳播很有影響力。(G3)

另一位受訪市議員則說：

> 我們舊部落地區某一個議員，他自己就是宮廟主委，他動員起來的時候，因爲又跨足黑道，他對樁腳說開多少（票）就要開多少，不然會被修理。可見地方派系結合宮廟或黑道的勢力很大。（C5）

由上述訪談推論這些宮廟樁腳，很快滲透到俗民網絡而有特定支持者，當然有些候選人本身就是宮廟主委或其家族，或如一些受訪菁英所說，某些宮廟和地方勢力或黑道關係深厚，則可能有特定候選人的樁腳綁樁，這和王金壽（2004b）所提到的基層樁腳的概念是符合的。

(三) 特質 3：相對水平的互惠模式

一位立委受訪時說：

> 宮廟方面，以左營爲例，這裡的廟宇是全國最多的地區，[12] 像城隍廟、北極玄天上帝，還有右昌的元帥府，後勁的聖雲宮等，也都有支持的人，可說各據山頭。（L2）

但另一位立委受訪時則與上述略有不同：

> 其實全臺灣到處都一樣，只要寺廟舉辦任何的活動，他很希望政治人物去那邊增添光彩，從市長、民政局長、立委、議員等，因爲這是最快可以看到人很多的地方，也增加自己的知名度。還有政治人物本身就是宮廟的主委，但是否說這間廟特別支持民進黨或國民黨，我覺得在他們來講，都是越多越好。（L1）

另一位市議員則提到位於蛋黃區的宮廟，訪談時說：

---

[12] 依據中研院「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及內政部網站的全國寺廟統計表，排名第一名臺南市 1,617 座、第二名高雄市 1,418 座、第三名屏東縣 1,117 座，高雄市宮廟密度確實很高。再依據左營區立法委員、議員及當地里長、耆老等於訪談時之口述，其所指左營宮廟密度居全國之冠，係聚焦於「蓮池潭」周遭，僅僅 500 公尺左右即有超過 20 座知名宮廟，密度居全國之冠，且香火鼎盛，不僅是本地民眾信仰之所在，且爲國內外觀光客參訪之重要景點，包括「城隍廟」、「啓明堂」、「元帝廟」、「慈濟宮」、「天府宮」、「清水祖師廟」、「三山國王廟」……等。

> 新社區裡也還是有寺廟活動，例如老祖廟每個月都辦犒將會（30 桌 300 人左右），信徒們就從附近大樓或透天宅裡走出來了，我都會盡量去參加，那些宮廟管委會的委員就覺得我這個人不錯。（C3）

綜上小結，雖然有受訪者說廟門總是開的，歡迎所有政治人物支持他的宮廟，但歸納大多受訪者意見，認爲談到某間宮廟時就會說那間廟是某某人的，即如前文所述的那四位代表性的宮廟政治人物，不只受訪者證實如此，他們本人受訪時也提到：我的這間廟……如何如何。可見地方政治人物與當地仕紳、頭人和宮廟的互動關係之深，尤其他本人就身兼宮廟管委會主委或董事長，當然就支持他自己或他的接班人，或是其派系推出的候選人。至於宮廟的都市型和邊陲型椿腳有何異同，受訪者說蛋黃區的宮廟和舊部落宮廟亦有相同之處，就是宮廟董事會和管委會都還是最重要的椿腳。不過都市型宮廟椿腳，對於傾向理念型的年輕人空氣票的影響力相對弱些。此外，受訪者多人還提到若宮廟椿腳又身兼里長影響力更大，會成爲多方候選人要爭取的椿腳。宮廟＋里長的相乘效果，甚至可以讓他自己也有當選機會，即如前述案例四 G2 某宮廟管委會委員所說的，這位宮廟主委兼里長，曾經是國民黨某市議員之椿腳，他在廣結善緣下也厚植了自己的政治實力而成爲了大椿腳，到 2018 年則由抬轎變成坐轎，以無黨籍參選並獲得當選，2022 年續獲連任，可見宮廟＋里長的椿腳影響力。

四、椿腳轉型是一種手段、目的是使得派系不崩解

總結以上，本文歸納出上述三種代表性轉型之椿腳類型與特質，並以功能、網絡及互惠模式等三個面向來歸納整理，如表 3 所示。一、在本質與功能上，農會椿腳是利益取向，以獲取金錢爲目的；里長椿腳是選票取向，以經營選區之里民服務來換取選票爲目的；而宮廟椿腳則是以公益爲取向，以其宗教信仰經營信眾情義吸引更多信徒認同。二、從其網絡發展的面向來看，農會屬傳統侍從主義，仍以派系網絡爲主；里長以里民服務爲重，故以椿腳網絡爲主、派系網絡爲輔，由過去之垂直轉爲相對水平；宮廟椿腳則是以俗民網絡爲主，椿腳網絡爲輔，希望得到信眾的最大認同。三、在互惠模式方面，農會仍是傳統由上而下之垂直模式，通常是以派系頭人與農會理事長、總幹事的互動爲主；里長椿腳由垂直轉爲兼具相對水

平互動，通常是與樁腳網絡的議員或派系網絡的市長進行合作；宮廟樁腳背後通常有支持的政治人物，但宮廟也「與人爲善」，故以相對水平互動爲主，現在甚至比過去更強，通常是以信眾人際關係取向來進行高度的整合。綜合觀之，第一種農會樁腳仍保持「恩庇侍從」型態的政治性的垂直運作，總幹事、理監事等從上到下，以派系網絡的運作爲主。第二種里長樁腳，因爲需以里民服務爲前提，與不分黨籍提供資源的議員、立委等合作，呈現相對水平的合作情形。不少里長隱匿自己政黨傾向，甚至放棄國民黨籍而以無黨籍來參選，就是要吸收中間選票。而「邊陲型」里長樁腳就是傳統 local 型，主要以人情網絡經營爲主，以選區服務爲先；「都市型」里長樁腳也需有里民服務，此外還要加上網路社群如臉書、Line 群組等的經營，以及設法打入大樓管委會來突破「空氣票」的挑戰。第三種宮廟樁腳，背後可能有政治人物支持，或其董事長、宮廟管委會主委及委員就是最重要的樁腳。都市型宮廟樁腳可能符合張佑宗、盧信宏（2014：29）所分類的三種，理念結合、利益結合，或以中間選民觀點檢視你的政見及政績；而邊陲型宮廟樁腳，在地方派系和人情關係上綁的更緊，有特定支持者的宮廟更多。研究也發現，若宮廟＋里長的雙重身分樁腳，是更有影響力的，因爲除了幫人抬轎，亦可厚植自己的政治實力，甚至參選市議員且獲得當選。總結以上，由特質上來說，宮廟樁腳自主性最高，其次爲里長，最弱爲農會。

表 3　樁腳轉型的類型與特質

樁腳類型 / 特　質	農　會	里　長	宮　廟
功　能	金錢取向 利益取向	選票取向 經營服務取向	信眾情義取向 公益取向
網　絡	派系網絡為主	樁腳網絡為主，派系網絡為輔	俗民網絡為主、樁腳網絡為輔
互惠模式	仍維持由上而下垂直互動模式，通常是派系頭人與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互動為主	由垂直而兼具相對水平互動，通常是與樁腳網絡的議員或派系網絡的市長進行合作	相對水平模式，且比過去更強，通常是以信眾人際關係取向為主進行高度的整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柒、研究發現及限制

綜合上述，本文透過深入訪談高雄市在地耆老及政治菁英等，蒐集資料來驗證前文假設之地方派系與樁腳是否依然存在？是否轉型以求生存？前文已驗證，依據王金壽之檢驗派系與樁腳變遷之三個標準，高雄市市派與縣派儘管有弱化及山頭化，但其派系領導人仍得到旗下各選區之市議員、里長、宮廟、宗親會、同鄉會及農會、水利會等之樁腳支持，仍有尚稱穩定之聯盟關係。不過，市派縣派在縣市合併後的競合關係，開啓了他們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轉型危機感，至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帶來國民黨全面性的聲勢下跌，更成爲轉型的重要契機。而派系要生存，最關鍵在於掌握樁腳，透過樁腳轉型方有可能繼續掌握選票，有了選票才有市議員席位及政治影響力。本文進一步驗證轉型後的代表性樁腳類型有三，(1) 農會：仍維持傳統垂直型樁腳，並無太大改變。(2) 里長：由垂直角色轉而兼具相對水平型的樁腳，國民黨籍里長淡化其政黨色彩或轉爲無黨籍，以爭取更多派系及個人利益和選票的支持；(3) 宮廟：其水平特質更爲突顯，除原有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之外，各界也更加重視宮廟對選民的凝聚力而拉攏廟方，因爲透過其「俗民網絡」的既多又廣，在選舉中的口語傳播速度快，其水平流動之影響力相對更大。當然宮廟影響力的大小，是否與特定區域（例如蓮池潭宮廟密度高）有關，由於查閱目前文獻並無相關研究，有待學界進一步探討。

再由訪談結果來檢驗樁腳特質（參考表 3），(1) 以功能來看，農會樁腳是利益取向爲主，里長樁腳是選票取向爲主，而宮廟樁腳則是以公益取向爲主。(2) 從網絡面向來看，農會樁腳以派系網絡爲主，里長樁腳以樁腳網絡爲主、派系網絡爲輔，而宮廟樁腳則是以俗民網絡爲主、樁腳網絡爲輔。(3) 互惠模式方面，農會仍保有傳統由上而下之垂直模式爲主；里長樁腳由垂直轉爲兼顧水平互惠，變遷最大；宮廟樁腳則是相對水平，除支持特定候選人（與其主委或董事長所屬派系之有關），但對於各界的拉攏示好，廟方基本上廟門大開是不會拒絕的。本研究亦發現，在地方派系樁腳求生存的前提下，前述「垂直型」農會樁腳與「相對水平型」之里長樁腳、宮廟

樁腳，在原高雄縣區有更加極化的現象，例如農會樁腳由上到下抓得更緊，由 2017 年地方農會選舉結果即可了解。

高雄市國民黨地方派系，經過本文以地方派系重要理論之侍從主義及社會關係網絡之文獻分析，再以王金壽檢驗派系與樁腳經過變遷的標準，透過訪談而得之寶貴資料驗證，得知市派雙派系（在地派、移民派）及縣派之紅派、白派至今雖已弱化、山頭化，但在 2010 年縣市合併及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刺激下，由無意識到有意識進行轉型，且由派系中最關鍵的角色樁腳開始轉型，轉型是手段，派系求生存才是目的。此種情勢下，也迫使國民黨市派與縣派必須合作以握有議會多數席次及議長大位才能繼續生存。市派此時也才有機會去吸納縣派的派系勢力，這也形成了今日高雄市國民黨地方派系的生態。

本文在研究限制上，由於僅以高雄市爲選取之研究個案，在適用範圍上可能亦只限於中南部如臺中市、高雄市等國民黨地方派系。但本文在理論脈絡之下，以高雄市地方派系及樁腳轉型之深度訪談所得之初步結論，期能提供學界在未來建立更爲完整的理論架構。在後續研究方面，建議可加上微觀層次及量化研究補充，再作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丁仁方，1999，〈統合化，半侍從結構，與臺灣地方派系的轉型〉，《政治科學論叢》，10: 59-82。Ting, Jen-fang. 1999. “Tonghehua, banshihzong jiehgou, yu Taiwan difang paisi de jhuansing” [Corporatization, Semi-Cliente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Local Faction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59-82.

丁仁方，2019，〈探索臺灣地方政治運作的基本特性〉，《臺灣民主季刊》，16(1): 141-154。Ting, Jen-fang. 2019. “Tansuo Taiwan difang zhengzhi yunzuo de jiben texing” [Exploring the Basic Natures of Taiwan’s Local Politic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6(1): 141-154.

丁仁方、趙卿惠、李依霖，2018，〈民進黨地方侍從體制與臺灣基層民主轉型－臺南經驗的啓示〉，《臺灣民主季刊》，15(1): 45-78。Ting, Ren-fang, Ching-hui Chao, & Yi-lin Li. 2018. “Minjindang difang shicong tizhi yu Taiwan

jiceng minzhu zhuanxing -- Tainan jingyan de qishi" [Local Clientelism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Grass-Root Democracy: Lessons from Tainan Experience].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5(1): 45-78.

中央選舉委員會，2024，〈投開票概況資料〉，選舉及公投資料庫，http://db.cec.gov.tw/，2022/10/15。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database. 2024. "Toukaipiao gaikuang ziliao" [Voting Overview Information]. in http://db.cec.gov.tw/. Latest update 15 October 2022.

王金壽，2004a，〈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爲例〉，《臺灣社會學》，7: 177-207。Wang, Jin-shou. 2004a. "Wajie zhong de difang paixi: yi Pingtung weili" [Collapsing Local Factions: The Case of Ping-Tung]. *Taiwan Sociology* 7: 177-207.

王金壽，2004b，〈重返風芒縣：國民黨選舉機器的成功與失敗〉，《臺灣政治學刊》，8(1): 99-146。Wang, Chin-shou. 2004b. "Chongfan fong mang sian: guomindang syuanjyu jichi de chenggong yu shihbai" [Returning to Feng-Mang County: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Kuomintang Political Machin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99-146.

王金壽，2007，〈政治市場開放與地方派系的瓦解〉，《選舉研究》，14(2): 25-51。Wang, Chin-shou. 2007. "Jhengjhih shihchang kaifang yu difang paisi de wajieh" [The Openness of Political Market and the Breakdown of Local Fa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2): 25-51.

王金壽、翁立紘，2019，〈追求地方政治研究的新典範〉，《臺灣民主季刊》，16(1): 127-140。Wang, Chin-shou & Frank Li-hong Weng. 2019. "Jhueichiou difang jhengjhih yanjiou de sindianfan" [To Pursue a New Paradigm of Local Political Studie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6(1): 127-140.

王家俊，2019，〈「地方派系高雄篇」，昔有紅白黑三大派系，今日只剩「陳菊幫」獨大〉，關鍵評論網頁，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local-factions/124723，2022/04/20。Wang, Chia-chun. 2019. "'Difang paisi Kaohsiung pian', si you hong bai hei sanda paisi, jinrih jhihsheng 'Chen Jyu bang' duda" ["Local Factions in Kaohsiung", in the Past there were Three Major Factions, Red, White and Black, but Today Only the "Chen Ju Gang"]. in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local-factions/124723. Latest update 20 April 2022.

王業立，1998，〈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派系〉，《選舉研究》，5(1): 77-94. Wang,

Yeh-lih. 1998. “Syuanjyu, minjhuhua yu difang paisi” [Elections, Democratization, and Local Fa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5(1): 77-94.

王業立、蔡春木，2004，〈從對立到共治：臺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 189-215。Wang, Yeh-lih & Chun-mu Tsai. 2004. “Cong duili dao gongzhi: Taichung xian difang paixi zhi zhuanbian”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The Change of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ount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89-215.

吳重禮，2002，〈臺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文獻的爭議：美國「機器政治」分析途徑的啓示〉，《政治科學論叢》，17: 81-106。Wu, Chong-li. 2002. “Taiwan diqu paixi zhengzhi yanjiu wenxian de zhengyi: America jiqi zhengzhi fenxi tujing de qishi” [Controversy about the Research on Taiwan’s Faction Politics: Learning from the Analytical Approaches of American Machine Politic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81-106.

胡　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 (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爲》，臺北：三民書局。Hu, Fu. 1998. *Jhengjhihsyueh de kesyueh tanjiou (san)*: *jhengjhih tsan yu yu syuan jyu sing wei*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3*)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lection Behavior*].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徐火炎，2005，〈認知動員、文化動員與臺灣 2004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爲—選舉動員類型的初步探討〉，《臺灣民主季刊》，2(4): 31-66。Shyu, Huo-yan. 2005. “Renjhih dongyuan, wunhua dongyuan yu Taiwan 2004 nian zongtong dasyuan de syuanmin toupiao singwei — syuanjyu dongyuan leising de chubu tantao” [Cognitive Mobilization, Cultural Mobiliza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s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lectoral Mobiliza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2(4): 31-66.

徐兆霖，2011，《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對地方派系的影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Shyu, Chao-lin. 2011. *Kaohsiung sian shih hebing gaijhih duei difang paisi de yingsiang* [*The Influences upon Local Factions after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翁立紘，2015，〈民主化的不確定性與地方派系的調適－臺灣地方派系研究的發展與展望〉，《民主與治理》，2(2): 67-82。Weng, Frank Li-hong. 2015. “Minjhuhua de bu quedingsing yu difang paisi de tiaoshih -- Taiwan difang paisi yuanjiou de fajhan yu jhanwng” [Uncertainti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Adaption of Local Faction: A Review of Taiwan's Researches of Local Fac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2(2): 67-82.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2024，〈統計資訊〉，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全球資訊網，https://agri.kcg.gov.tw/FileUploadCategoryListC006100.aspx?Pindex=2&CategoryID=80fd3057-67e8-4a57-9a99-66d1612ca740，2022/05/22。Agricultural Bureau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2024. " Tongji zixun" [Statistics]. Latest update 22 May 2022.

張佑宗、盧信宏，2014，〈總統選舉、國家認同與侍從主義的消失？2000 年後雲林縣的個案研究〉，《政治科學論叢》，61: 1-40。Chang, Yu-tzung & Hsin-hung Lu. 2014. "Guojia rentong yu shicong zhuyi de xiaoshi? 2000 nian hou Yunlin xian de gean yanjiu"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Clientelism in Yunlin County after 2000].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1-40.

莊卓穎，2015，《臺灣成形中之地方政治新生態初探：從縣市層級選舉觀察臺中市與嘉義縣地方派系》，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uang, Cho-ying. 2014. *Taiwan chengsin jhong jhih difang jhengjhih sin shengtai chutan: tsong sian shih tsengji syuanjyu guancha Taichung shih yu Chiayi sian difang paisi* [*A Pioneer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New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in Taiwan: Observation of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ity and Chiayi County at the County-Level Elections*]. Master thesis, Departmr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陳介玄，1997，〈派系網絡、椿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臺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編），《地方社會》，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31-67。Chen, Chieh-hsuan. 1997. "Paisi wangluo, jhuangjiao wangluo ji sumin wangluo: lun Taiwan difang paisi singcheng jhihshe hueiyi" [Faction Networks, Voting Broker Networks, and Folk Networks: the Social Meaning of Taiwan's Local Factions Formation]. In *Difang shehuei* [*Local Society*], ed.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31-67.

陳明通、朱雲漢，1992，〈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資料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1): 77-97。Chen, Ming-tong & Yun-han Chu. 1992. "Quyuxing lianhe duzhan jingji, difang paixi yu sheng yiyuan xuanju: yixiang sheng yiyuan houxuanren beijing ziliao de fenxi" [Regional Monopoly Economy, Local Factionalism

and Provincial Councillor Elec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Data of Provincial Councillo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77-97.

陳華昇，1993，《威權轉型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分析》，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en, Hua-sheng. 1993. *Weichyuan jhuansingchi difang paisi yu syuanjyu jhih guansi: Taichung sian difang paisi jhih fensi*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Factions and Election: A Case Study of Taichung County (1986-1993)*]. Master thesis, Departmr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陳麗雅、王業立，2016，〈縣市合併後地方議會次級團體之運作：以臺中市爲例（2010-2014）〉，《政治科學論叢》，67: 51-90。Chen, Li-ya & Yeh-lih Wang. 2016. "Xianshi hebing hou difang yihui ciji tuanti zhi yunzuo: yi Taichung shi yihui weili (2010-2014)" [A Study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City Council Sub-Groups after the Merger of Taichung City and Taichung County (2010-2014)].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7: 51-90.

陳麗雅、王業立，2019，〈民進黨爲何攻不下農會？以 2017 年臺中市潭子區、大雅區農會選舉爲例〉，《政治科學論叢》，82: 115-152。Chen, Li-ya & Yeh-lih Wang. 2019. "Minjindang weihe gongbusia nong huei? yi 2017 nian Taichung shih Tanzi chyu, Daya chyu nonghuei syuanjyu weili" [Why Can'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in the Majority of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Elec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2017 Elections in Tanzi and Daya Districts in Taichung Cit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2: 115-152.

曾權林，2005，《地方派系組織與選舉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三民區爲例》，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Tseng, Chuan-lin. 2005. *Difang pasi zujhih yu syuanjyu guansi jhih yanjiou—yi* Kaohsiung *shih Sanmin chyu weili*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Factions Organizations and Elections—San-Ming District in Kaohsiung as an example].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Adult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游清鑫，1996，〈臺灣政治民主化之鞏固：前景與隱憂〉，《政治學報》，27: 201-233。Yu, Ching-hsin. 1996. "Taiwan jhengjhih minjhuhua jhih gonggu: chianjing yu yinyou" [The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Political Democracy: Prospects and Concern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 201-233.

湯京平、陳冠吾，2013，〈民主化、派系政治與公民社會：以嘉義縣的社區

營造與「終結派系」爲例〉，《臺灣民主季刊》，10(2): 105-137。Tang, Ching-ping & Kuan-wu Chen. 2013. “Minjhuhua, paisi jhengjhih yu gongmin shehuei: yi Chiayi sian de shechyu yingzao yu ‘jhongjieh paisi’ wei li” [Democratization, Faction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The Case of Community--Building and the ‘Termination of Faction’ in Chia-yi County].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0(2): 105-137.

黃德福，1992，《民進黨與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臺北：時英出版社。Huang, De-fu. 1992. *Minjindang yu Taiwan dichyu jhengjhih minjhuhua*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Taipei: Shiying Publishing House.

黃德福，1994，〈政黨競爭與政治民主化：臺灣地區政黨體系的新挑戰〉，《選舉研究》，1(2): 199-220。Huang, De-fu. 1994. “Zhengdang jingzheng yu zhengzhi min zhu hua: Taiwan diqu zhengdang tixi de xin tiaozhan” [Political Party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New Challenge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 199-220.

黃德福、劉華宗，1995，〈農會與地方政治：以臺中縣與高雄縣爲例〉，《選舉研究》，2(2): 63-82。Huang, De-fu & Hua-zong Liu. 1995. “Nonghui yu difang zhengzhi: yi tai zhong xian yu kao xiong xian weili” [Farmers’ Associations and Local Politics: The Cases of Taichung County and Kaohsiung County].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2): 63-82.

楊永年、王宏文，2017，〈臺北市里長如何運用里鄰建設服務經費：以信義區爲例〉，《行政暨政策學報》，64: 69-102。Yang, Yung-nien & Hong-wung Wang. 2017. “Taipei shih lijhang ruhe yunyong lilin jianshe fuwu jingfei: yi sin yi chyu wei li” [How the Li Chiefs Use the Li-Lin Infrastructure Funds in Taipei: A Case Study of Xin-Yi District]. *Public Administration & Policy* 64: 69-102.

廖達琪、洪澄琳，2004，〈反對黨獨大下的分立政府：高雄縣府會關係的個案研究（1985-2003）〉，《臺灣政治學刊》，8(2): 5-50。Liao, Da-chi & Chen-lin Hung. 2004. “Fandueidang duda sia de fenli jhengfu: Kaohsiung sian fuhuei guansi de gean yanjiou (1985-2003)” [Divided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Case of Kaohsiung County’s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Relations (1985-2003)].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5-50.

趙永茂，1996，〈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政治科學論

叢》，7: 39-56。Chao, Yung-mao. 1996. “Taiwan difang paisi de fajhan yu jhengjhih minjhuhua de guansi”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Fac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 39-56.

趙永茂，1997，〈地方政府組織設計與組織重組問題之探討〉，《政治科學論叢》，8: 183-212。Chao, Yung-mao. 1997. “Difang jhengfu zujhih sheji yu zujhih chongzu wunti jhih tantao”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 A Case Study o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 183-212.

趙永茂，2002，《臺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臺北：翰蘆出版社。Chao, Yung-mao. 2002. *Taiwan difang zhengzhi de bianqian yu tezhi* [*The Changes and Traits of Taiwan's Local Politics*]. Taipei: Hanlu Press Inc.

趙永茂、黃德福、李彪、胡幼偉，1994，〈政黨政治與八十二年縣市長選舉新聞報導：黨派、省籍與民意〉，《臺大新聞論壇》，1(1): 172-180。Chao, Yung-mao, Teh-fu Huang, Biao Li, & Yu-wei Hu. 1994. “Jhengdang jhengjhih yu ba shih er nian sianshihjhang syuanjyu sinwun baodao: dangpai, shengji yu minyi” [Party Politics and 1982 County Mayor Election News Coverage: Party, Provincial Citizenship and Public Opin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ews Forum* 1(1): 172-180.

趙卿惠，2017，《民進黨臺南執政侍從結構變遷之研究，1993-2013》，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所博士論文。Chao, Ching-hui. 2017. *Minjindang Tainan jhihjheng shihzong jiehgou bianchian jhih yanjiou 1993-2013* [*The Transitions of Clientelism in DPP's Tainan Government, 1993-2013*].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蔡榮祥，2014，《雲嘉南地方派系的持續與變遷》，新北市：華藝線上出版社。Tsai, Rong-xiang. 2014. *Yun jia nan difang paixi de chixu yu bianqian*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of Local Factions in Yunlin County, Chiayi County and Tainan County*]. New Taipei City: Airiti Press Inc.

二、西文部分

Fox, J. 1997.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Lessons from Mexico”. In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eds. Douglas A. Chalmers, Carlos M. Vilas, Katherine Hite, Scott B. Martin, Kerianne Piester, & Monique Segar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1-420.

Jacobs, J. B. 1980. *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A Field Study of Mazu Township, Taiwan*.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Kitschelt, H. & Steven I. Wilkinson. 2007.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 An Introduction." In *Patron,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erbert Kitschelt & Steven I. Wilkins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

Wu, N. T.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附錄 1

高雄市地方政治菁英訪談對象類別及背景簡述

代　碼	分　類	受訪者背景簡述
C1	市議員	無黨籍資深市議員
C2	市議員	國民黨資深市議員
C3	市議員	民進黨市議員
C4	市議員	國民黨市議員
C5	市議員	國民黨市議員
C6	市議員	國民黨市議員
C7	市議員	國民黨資深市議員
C8	市議員	國民黨資深市議員
G1	地方仕紳	地方耆老、資深無黨籍里長
G2	地方仕紳	某寺廟管理委員會委員
G3	地方仕紳	地方耆老、資深無黨籍里長
L1	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法委員
L2	立法委員	國民黨立法委員
P1	學者專家	大學教授
P2	學者專家	大學教授
R1	報社記者	報社記者、前採訪主任
V1	里　長	國民黨資深里長
V2	里　長	民進黨里長
V3	里　長	無黨籍里長
V4	里　長	國民黨里長
V5	里　長	無黨籍里長
V6	里　長	國民黨里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Local Fac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ote Brokers:

A Case Study of Kaohsiung City*

*Tian-jie Yang***

Abstract

Local politics and clientelism were controlled by the KM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ir rule in Taiwan. Followi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e debate among scholars has been whether the structure of local factions has collapsed entirely, has not disappeared but become fragmented, or has become a more mountainous structure. Some scholars organize these viewpoints into two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theories. Taking Kaohsiung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of factions, examines whether local factions and their vote brokers have transformed, and analyzes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transformations. Since prior to the merger of counties and cities, Kaohsiung City's municipal faction has controlled almost the entirety of the Kaohsiung City Council, yet if the municipal faction has now disappeared, how can this still be the case? Was the merger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2010 a catalyst, with the student Sunflower Movement of 2014 bringing even greater impact? Did these events stimulate an unconscious to conscious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factions and vote broker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2014 and 2018 local elections after the merger as the main research scope, and extends the study to the 2020 by-elections and the 2022 elections. This article adopts a methodology of in-depth interviews, including with local political elites, elders and scholars, to collect first-hand inform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some minor vote brokers penetrate into variou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lections. They may then grow into major vote brokers and survive through

---

* DOI:10.6166/TJPS.202403_(99).0003

** Tian-Jie Yang,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109252503@nccu.edu.tw

transformations with considerable resilienc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types of transformations of vote brokers: the traditional vertical peasant associations, the relatively horizontal villagers, and the relatively horizontal temples.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after the merger, the county faction weakened, but the city faction absorbed the county faction and was able to survive.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cademic circles with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orie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factions and vote brokers in Taiwan.

Keywords: Vote Brokers, Local Factions, Clientelism, Social Network

110 地方派系與椿腳轉型：高雄市的個案分析 楊天傑